

“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姜方炳

(杭州行政学院 社会学教研部, 浙江 杭州 310024)

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强烈而自觉的互动。其间,离不开先进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文化自觉”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的一种必需。这既是社会学学科的品格使然,更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对异域思想文化的鄙夷和排斥,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知之明”,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主性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应。

关键词: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99(2010)04-0051-05

马克思被誉为经典社会(或社会学)理论的三大奠基人之一^①,由他和恩格斯共同孕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20世纪以来的中华大地无疑是它广为传布与发挥效能的重要场域,这个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在中国纯属“舶来品”,在西方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笼罩下,中国社会人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已明显地感到面临话语自主性失落的困境。这固然有客观的历史文化因素,但更多的是长期对西方文化的过分推崇所导致的学术上的比附性使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呼吁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知自明”,这不可谓不及时,不可谓不睿智。在此,我们想提出的问题是,作为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否体现了“文化自觉”?如果是,“文化自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否是一种必需?这是本文所关心和力图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如何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一、“文化自觉”的提出及其意涵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正式提出来的。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一文中,费老是这样解释“文化自觉”的:文

收稿日期:2010-05-05

作者简介:姜方炳(1983-),男,浙江江山人,杭州行政学院教师,法学硕士。

^① 除马克思之外还有法国的涂尔干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在西方学术界的诸多场合,马克思常常首先被作为一名杰出的社会学家看待。

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同时，他对“文化自觉”先后作了“学术道德规范”、“文化理论范畴”、“文明发展观念”三个层次的阐述。作为学术道德规范，“文化自觉”是学者对待学术的良知和责任；作为文化理论范畴，“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待文化的理性思维和实践精神；作为文明发展观念，“文化自觉”是不同文明在交往中应具有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伦理规范和健康心态。^[1]

如果说“学术道德规范”是费老在晚年对自身学术生涯的一次清算、一种自觉，那么“文化理论范畴”、“文明发展观念”则是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激荡的社会背景下，他作为一名“自知之明”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在思想上的一种姿态，在理论上的一次贡献。在费老的思想体系中，“文化”一词本来就是用来表达人们为了适应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2]因之，当下“文化自觉”的基本落脚点就是，在现代性进行全球性扩张并带来精神危机等困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自我在多元文明交汇的洪流中的适应能力、自主能力、创造能力。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

从“文化自觉”概念的正式提出到被学术界加以广泛而热烈的探讨，只是最近 10 年的事情。那么，“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是否也是晚近的事情呢？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于 19 世纪中期（更准确地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此，中国也随之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既有居庙堂之上的高官沉酣于“天朝上国”的美梦而虚妄自大，也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仁人志士为救国救难而身先士卒。“洞悉敌情”、“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变法”、“中体西用”的嬗变无不耗费了国人的诸多心力。如果说这只是衰朽的封建王朝在守成心态思想制度层面的无谓挣扎，那么 20 世纪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推陈出新则是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缤纷呈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导入与流播更是其中璀璨夺目的一道风景线。

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屈辱的世纪，也是一个寻求富强繁荣的世纪；是一个失落的世纪，也是一个民族自觉最强烈的世纪。^[3]得风气之先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倡导，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的充分自觉。既然译介国外的思想著作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那么所选择的内容必需具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特质。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下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陈翰笙、李达、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赫然入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先进的中国人注重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消融异域文化间的差异性与对立性。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就是文化自觉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则是我党在新时期“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

三、“文化自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一种必需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结合，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就是在救国图强的探索道路中“文化自觉”的实践者。同时，“文化自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也是一种必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融入中国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必须对绵延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抱持一种自觉的态度。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更是文化的特性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双重性的

必然要求。

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现代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次、多面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人思想文化上的现代化。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国家富强繁荣的道路上都注重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开启民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4]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社会(或社会学)思想的传入与流布之所以如此迅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的自觉。其间,不仅涌现出一大批紧跟时代步伐的弄潮儿,而且产生了大量具有理论性、实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章或著作,例如,李大钊1920年前后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我国各界主要领导者更是“文化自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昭示着“文化自觉”的社会效应和时代意义。据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大致经历了早期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分析,“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四个主要阶段。^[5]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历的以上四个阶段的中国化过程,正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勇于探索、不断前进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人摆脱“文化自卑”的民族心理走向理性重估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自觉”的过程。

2. 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决定了必须“文化自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社会是一个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并以社会个体的行动及其相互间处于动态的社会关系为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必须以现实的人作为其分析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其基本的社会分析模型,以唯物史观作为其主要的社会分析工具,以人与社会和自然及其关系作为其社会分析对象。

然而,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这也就决定了无论是“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还是“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①,都必须在“文化自觉”中汲取不断发展的动力。具体来说,这是由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共同决定的。如前所述,文化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历时性的范畴,这也就是文化之所以具有时代性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社会虽然由马克思、恩格斯在现代性不断扩张的社会背景下创立的,但社会瞬息万变,他们的社会学思想也难免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就必须融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先进思想,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依靠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抛却对这根的传承也就放弃了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由。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健康传播与深化的历史,正是中华儿女在思想和行动上对我国传统文化高度自觉的历史。任何想把国外看似先进的社会思想照搬到中国来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企图都被现实失败的悲剧无情地嘲弄了。

3.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两重性决定了必须“文化自觉”。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活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任何两种异质文化在相逢时都免不了发生碰撞、抵牾的现象,这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对立性所致。然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也绝非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板块,在不断的冲突与磨合、排斥与涵容中,不同文化也会在文化主体的实践过程中发生形变、转化并继续绵延下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国情如何接触、交融及转化的过程。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本质上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也必然存在着对立与契合的两重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对立性。传统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断的连续体。中国的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沉淀,既保存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也带来了很大的历史惯性和沉

^① 学术界还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历程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和“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前者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旧社会的否定而言,后者则是就它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和维护而言。

重的文化包袱。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立于现代性正蓬勃发展并向世界蔓延的 19 世纪的西欧,基于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差异,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存在隔阂并相互排斥。但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单从对立性片面地去理解这两者间的关系。以儒家思想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唯物辩证法的精神特质,其具有的非宗教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使得它经历了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仍保持了自身独特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因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中国传统元素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关于这一点,中国著名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已给我们提供了精辟的论断:“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6]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万万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的。百年来中国历史中血与火的痛切教训,恰如其分地印证了“文化自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有了人们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免遭更多的挫折,中国特色社会学才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中国在现代化事业也才能避免误入“全盘西化”的歧途而积重难返。

四、小 结

在中国,社会学应该是“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modernization),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应当服务于当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如费老所言,“发展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用传统学术‘复归’的办法,也不能走‘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的路,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使研究社会的这门学科成为科学”。^[7]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也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阶段。通过上文的思考和分析,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此作个简要的总结,同时重申并强调其中的几个观点。

第一,“文化自觉”作为一个概念的正式提出虽是晚近的事情,但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或社会现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启动时就体现在先进中国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本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要注重文化自觉,只是主张在与国际社会学界互动的过程中要立足本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注入更多的地方性知识。

第二,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自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复归传统”、固步自封,逆全球化的潮流而为。现代化大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而是各个民族国家参与下的“一元多线”式的世界发展潮流。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基石,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是难以全然抛却传统而阔步前进的。

第三,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就等同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应包括世界上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思想。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觉既是中华文明与异域文明之间的共生之道,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多种文化之间的共生之道。中国特色社会学应该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并促进中国国内、国际交流的社会学。因此,我们应该淡化在学科建设中基于意识形态的诸多分歧,融会一切社会学思想为我所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和而不同”而又能“美美与共”才是我们所要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美美与同”和人类文明(下)[J]. 群言, 2005(2): 13-16.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15.
- [3] 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M]. 广东: 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 197.
- [4] 郑杭生. 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 卷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32.
- [5] 陈国庆, 李中.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60-64.

[6]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00.

[7] 苏国勋. 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J]. 社会学研究,2006(2):1—12.

[责任编辑:林丽芳]

On the Necessity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Marxism Sociology's Localization in China

JIANG Fang-bing

Abstract: Marxism Sociology's localization in China interacted with China's modernization strongly and consciously from the beginning which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advanced Chinese '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Marxism Sociology's localization in China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the necessity of Marxism Sociology's localization in China. This is the result of sociology's character, and even more is the certain demand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mphasiz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rxism Sociology's localization in China doesn't mean to despise and reject foreign culture, but be self-knowledge to our cultural tradition in modernization and is the inevitable response on thought and culture to enhance our nation's autonomy.

Keywor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Marxism sociology; Localization in China; Modernization